以孔子为切入点： 重释王炳照先生教育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兼谈中国教育史领域的批判与继承问题

孙 杰

摘要：以《论“学而优则仕”》一文的发表为标志，在王炳照先生提出如何重新评价孔子的新主张之时，恰好是教育史领域以重新评价孔子教育思想为突破口，来恢复教育史学科在培养人才和教育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历史起点。先生从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化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继承和发扬教育遗产的新方法——“二重性·两点论·双重任务”，从学理层面回答了教育史领域如何开展批判与继承的基本问题，为教育史学科开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路径遵循。陈元晖先生倡导中国教育学史研究，是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而教育史领域探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教育遗产的学术价值就在于此。让中国教育学史化身为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一朵彩云，正是从陈元晖先生到王炳照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愿望！

关键词：王炳照；教育史学思想；二重性·两点论·双重任务；中国教育学史

中国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4)04-0024-11

王炳照先生在自述“我的学术探索之路”时指出：“1980年4月，在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论“学而优则仕”》，这应该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①先生之所以阐明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因为在此之前曾发表过一篇“算不上什么学术论文”的论文。如果结合先生发表论文的时代背景，那么，《论“学而优则仕”》一文不仅是先生开展教育史研究的学术起点，而且恰好是教育史领域以重新评价孔子教育思想为突破口，来恢复教育史学科在培养人才和教育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历史起点。这就是本文为何选择以孔子为切入点，来重新诠释王炳照教育史学思想的双重动因。

一、为什么要重新评价孔子

教育史领域之所以要重新评价孔子是有其特殊历史原因的。先生就此分析道：“教育史领

谨以此文纪念王炳照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作者简介：孙杰，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太原 030006）。

①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自序”。

域的拨乱反正是以重新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为突破口的。‘文革’期间，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掀起的‘批儒评法’、‘批周批孔’，将‘史为今用’片面推向极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被‘砸烂批臭’，造成了对教育史学科的极大扭曲。‘文革’结束，大家不约而同选择以重新评价孔子教育思想，其意义可能远远超出了对孔子本人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重新认识，而是涉及教育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张瑞璠先生、杨荣春先生接连发表文章，对孔子的‘有教无类’、教学教育方法进行了‘再评价’。1980年创刊的《教育研究》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孔子教育思想笔谈’会^①，约请教育学界、思想史界和历史学界的学者参与，毛礼锐先生等应邀到会，回来还专门给我传达了‘笔谈会’的各派观点，感叹说，‘已经敢有人把孔丘称之为孔子了，孔子又一次重见天日了’。”^②以重新评价孔子为突破口，来推动教育史研究者对教育史学关键问题的讨论，不仅是教育史领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的关键一环，而且是推动教育史学科建设重新走上正确道路的必要一步。

孔子之所以成为批判的聚焦点，与儒家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密切相关。先生在《〈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绪论》一文中，从一种教育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应具备的三个条件出发，系统阐述了儒家教育思想为何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教育思想。先生指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总要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教育思想，同时还会存在多种占非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呈现出教育思想的多元性。主体教育思想的形成是通过各种教育思想长期对抗、论争、融合、吸收而逐步确立的。一种教育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不是偶然的，一般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第二，同当时的教育实践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第三，善于融会教育思想的历史传统和各种教育思想的长处。一般来说，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总是反映着当时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进步趋势，凝聚着当时人们对社会和教育认识的最高成果，具有较强的活力。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如果不能反映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就必然会逐步丧失其优势，退出主导地位，而由原来不占主导地位或新诞生的教育思想所取代。”^③儒家教育思想之所以长期居于主导地位，首先，是由儒家学派所具备的长处和优势决定的。儒家教育思想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宗，实际又是“以述代作”。“寓作于述”便于融会和凝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和先圣前贤的智慧，根植于广阔而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又致力传播民族文化于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无论是面对儒家教育思想的内部分化，还是其他学派教育思

^① 《教育研究》1980年第3、第4期连续刊登“孔子教育思想笔谈”的相关内容。第3期的“编者按”写道：“要总结中国古代教育遗产，用以丰富我们的教育学，首先必须总结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此，我们组织了孔子教育思想笔谈（为了弄清这一问题，笔谈的内容有必要适当超出教育思想的范围）。但是，总结孔子教育思想，并非一蹴而就。我们只是希望通过笔谈，把不同认识都摆出来，以便教育理论工作者进一步研究。参加这次笔谈的同志很多，由于本期稿件特别拥挤，这里按笔谈收到顺序先发表几篇，其余大部分笔谈稿，将在《教育研究丛刊》今年第二期上发表。”发表在《教育研究》第3期的笔谈共7篇：《应把孔子教育思想的研究再提高一步》（何寿昌）、《孔子教育思想要具体分析》（蔡尚思）、《可以肯定的东西要多一些》（张瑞璠）、《仁的教育思想》（周谷城）、《批判地继承思想遗产》（周德昌）、《孔子的道德教育》（周辅成）、《孔子的美与美的思想》（李泽厚）。第4期的笔谈共4篇：《把思想放开些》（庞朴）、《孔子教育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严北溟）、《由学在官府到学下私人是历史的进步》（孙叔平）、《“学而优则仕”是春秋时期教育思想的新命题》（柳之桀）。

^② 王炳照口述，周慧梅整理：《王炳照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③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想的多次冲击，儒家都能较快地调整自身、发展自身，消解分歧、求同存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正是凭借学派的自身长处和优势，在从原始儒家、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儒家都能通过整合内部、融合各家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来巩固自我的主导地位。其次，儒家学者以献身教席为己任，既造就了一代代的儒学传人，又加强了儒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联系，教育实践丰富多彩的现实滋养着儒家的教育思想，从而使儒学始终保持着学派的凝聚力和思想的生命力，这是儒家教育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儒家教育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契合。中国自秦汉以来基本上都是实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关系是宗族宗法制，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形态，文化传统是社会至上、伦理为本。儒家教育思想强调隆礼重道、尊师重教，政教一元、官师一体，社会本位、修身为本，伦理为宗、道艺兼求，孝悌为本、忠恕为上。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孕育了儒家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又有力地维系着中国社会与文化。正是这种彼此之间形成的互融与共生关系，造就了儒家教育思想的主导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自然被视作儒家教育思想的代言人，教育史领域以孔子为突破口来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教育遗产的原因就在于此。以《论“学而优则仕”》一文^①的发表为标志，先生提出了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孔子教育思想的新主张^②，从实践层面率先回应了教育史领域亟须解决的新问题。首先，“学而优则仕”不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儒、墨、法各家都主张‘学而优则仕’，都反对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反对仕而不学和学而仕，只是学的内容和方法不同、优的标准和要求不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从总体上看是相当保守的，但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不仅不能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且不断冲击和削弱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因此，断定‘学而优则仕’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教育思想是没有历史根据的。”^③其次，封建社会不能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人们常说“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教育的灵魂，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全面。同样，那种认为科举制度完全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精神，并以此为根据，把“学而优则仕”说成整个封建教育的灵魂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最后，从批判“学而优则仕”中吸取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是我们对待历史遗产的基本原则。在对待“学而优则仕”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已经表明，遵循这条原则，就能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违背或破坏了这条原则，就必然阻碍甚至毁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之后，先生又相继发表了《试谈孔子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试论孔子教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等学术论文^④，并在其承担撰写的《简

① 王炳照：《论“学而优则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② 王炳照先生对自己以“学而优则仕”为突破口来重新评价孔子教育思想，曾作出如下评价：“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就当时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来讲，我提出这种观点，被不少人称为‘胆子够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学而优则仕’说成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之一；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人常常把‘学而优则仕’作为批判的重点，说它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教育路线的核心；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人也常常批判‘学而优则仕’，把它说成是封建教育的灵魂。‘学而优则仕’被视为没落的、反动的教育思想，似乎仍然是一种定论。”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自序”。

③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④ 《浅谈孔子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试论孔子教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明中国教育史》^①“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之“第三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从“孔子的生平和教育活动”“孔子在教育基本理论上的主张”“孔子的教学思想”“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孔子关于教师的论述”五个方面,全面构建了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新”体系,在教育史领域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并与外国教育史领域重新认识和评价杜威教育思想的学术研究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此阶段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工作。^②

二、如何正确对待中国教育遗产

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史领域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重新评价,“其意义远不止是对孔子本人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重新认识,而是涉及教育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对孔子教育思想重新评价的必然逻辑发展,是如何全面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教育遗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③在重新认识和评价孔子“学而优则仕”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王炳照先生从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化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继承和发扬教育遗产的新方法——“二重性·两点论·双重任务”,从学理层面回答了教育史领域如何开展批判与继承的基本问题,为教育史学科开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路径遵循。

(一)“二重性·两点论·双重任务”的新方法

顾明远先生指出:“他(王炳照先生)在教育史学研究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倡导实事求是和推陈出新。例如,他对待传统教育持两点论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传统教育重视德育,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形成了多方面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强化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勒紧了四大精神枷锁’。他认为只有坚持两点论才能认清传统教育的本质,才能正确处理传统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④这段评价中的两个术语——“二重性”“两点论”,正是王炳照先生提出的正确对待中国教育遗产的新方法。^⑤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化的讨论,人们最关心或最感兴趣的问题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悠久丰富的传统教育遗产对中国的现代化起着什么作用,具体地说,中国传统教育对现代化的进展是宝贵的财富,还是沉重的包袱?另一方面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有哪些传统教育遗产应该和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⑥究其实质,先生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形成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教育遗产的立场和方法。

先生是从阐释中国传统教育的二重性入手,来探讨如何开展中国传统教育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工作。先生认为,二重性既是认识和揭示中国传统教育本质特征的方法论,又体现了中国传

① 《简明中国教育史》一书正式出版是在1985年,其“前言”写于1983年10月。

② 1982年5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编务组从参加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的论文中,选取研究孔子、陶行知、杜威和赫尔巴特等人教育思想的论文,编成《孔子教育思想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和《杜威和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研究》,集中体现了教育史工作者在此阶段对于孔子、陶行知、杜威和赫尔巴特等人教育思想的重新评价和认识。孙杰著:《共和国教育学70年·教育史学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1页。

③ 田正平:《老学科 新气象——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述评》,《教育研究》2008年第9期。

④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前言”。

⑤ 王炳照:《二重性·两点论·双重任务——略论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⑥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08页。

统教育的最本质特征。那么, 如何来理解中国传统教育的二重性呢? 先生结合中国传统教育的职能、功能及培养目标三个基本范畴, 给予了详细阐述和系统说明。首先, 中国传统教育的职能具有二重性。中国传统教育充分发挥着社会政治和伦理文化的功能, 但在充分发挥政治功能优势的同时又束缚、限制着社会经济、物质生产和对自然界认识功能的发挥。其结果是统治者越重视教育, 就意味着对教育的全面控制, 越容易导致教育功能的偏离。其次, 中国传统教育在功能上具有二重性。中央集权式的封建专制需要的是民众的愚昧无知, 这一点构成了中国古代“重视教育与制造愚民”这个鲜明的二重性。最后, 中国传统教育的培养目标具有二重性。传统教育在统一的教育体制和科举选士制度下, 掩盖了教育的严格等级性, 实施双重的教育目标, 既培养“修己治人”的治术人才, 又通过社会“教化”造就大批的俯首听命的“顺民”。与此同时, 受中国传统教育职能、功能及培养目标所具有的二重性的制约, 中国传统教育在教育内容、原则和方法等方面也无不具有鲜明的二重性。

先生以剖析中国传统教育的二重性为根基, 倡导应该坚持两点论, 以此来担负起现代化赋予传统教育研究的双重任务。对于如何在中国传统教育研究中坚持两点论, 先生从以下四个方面给予了方向性指导。首先, 坚持两点论, 就是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以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教育重视德育、强调社会本位、民本思想传统, 以及始终提倡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等方面具有的二重性。其次, 坚持两点论, 要求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中国传统教育, 提防用静止的、凝固的观点看待中国传统教育。这就要求既要探明中国传统教育的各主要内容或因素自身演进的客观规律, 又要揭示人们的主观意向及统治者的政策导向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和运用水平, 特别应注意违背客观规律对教育发展所造成的干扰、破坏及其必然遭受的历史惩罚, 并应学会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再次, 坚持两点论, 要求对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化的研究必须既立足中国, 又放眼世界; 既立足现实, 又放眼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世界范围全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的历史长河中, 来审视中国传统教育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最后, 坚持两点论, 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 看待现实, 展望未来。故此, 在先生看来, 只有坚持两点论, 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和揭示中国传统教育的二重性, 才能在实践中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教育研究的双重任务: 一方面, 需要经过现代化的审视、筛选、改造、充实, 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焕发出新的生机; 另一方面, 更需要致力清除、排除中国传统教育中束缚和阻碍现代化的历史“垃圾”, 以更大程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遗产。

综上所述, 先生从二重性出发到坚持两点论, 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面认识和深度思考, 为教育史领域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遗产, 系统理解现代化赋予中国传统教育研究的双重任务, 提供了方法指引和路径遵循。这正是先生提出“二重性·两点论·双重任务”方法的价值所在。

(二)“书院·科举·私学”的新探索

先生集中围绕书院、科举、私学三个古代教育的核心要素, 就教育史研究领域如何遵循“二重性·两论点·双重任务”的方法论, 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教育遗产进行了新的探索, 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和范例。

先生是“奉师命研究书院”。先生在《我的学术探索之路》中写道:“1980年5月下旬, 陈

元晖先生找到我，将一份古代书院的撰写提纲和几十页发黄的讲义交给我，希望能整理、扩充成为十多万字的书稿。历经一个暑假的挥汗如雨，终于形成了12万余字的书稿，从书院的起源、书院的教育内容、书院的管理特点以及对今天教育的借鉴等来论述古代书院。陈先生看过后很满意，说：‘能不能把它整理成一篇文章，找个地方发表，听听大家的看法？’我随即将其缩写为约1.6万字的篇幅，投到了北师大学报。主编认为很好，随即于10月在第5期发表，我署名第二作者，反响很不错。该书稿次年以《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为书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署名第三）。有研究者认为‘此书奠定了书院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启了新时期书院研究的先声’，把我称作研究书院的先锋，我认为有点过誉。”^①之后，先生又对书院教学、书院精神展开了深入探讨，发表了《书院教学的革新精神》（《寻根》2006年第2期）、《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3期）等学术论文；又和李国钧、李才栋合作主编《中国书院史》，出版了《中国古代书院》一书，撰写了陈学恂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中“宋代书院”章节的内容。再之后，“在不少人眼里，我（先生）便成了研究书院的专家”。至于先生为何能从秉承师命转为自主探索乃至成为书院研究的专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我（先生）一直强调要注重书院精神，它是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积淀和凝炼而成的优良传统的结晶、书院办学传统的灵魂。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书院制度的存废、书院办学型制的变异时有发生，而书院精神却是永存的，自然成为中华民族教育遗产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每当酝酿或推行新的教育变革时，人们往往会打开教育历史遗产宝库，获取智慧，寻求启迪和借鉴，并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运用于教育变革的实践中，在运用中进一步丰富和创新。而这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又逐渐沉淀和生成新的历史优秀传统。书院精神久为人们所关注，并在历次教育变革中得到传承和创新，丰富了内涵，增强了生命活力。这也是我一直关注书院研究最基本的动力所在。”^②继往开来，先生认为书院研究应主要聚焦三个层面的工作：首先要加强对书院文献、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以便为深入研究储备充足的资料；其次要开展与书院有关的专题研究，以推动书院研究的系统化和体系化；最后要加强对中国书院在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传播、发展和影响研究，特别要注重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研究，以进一步拓展书院研究的空间、领域及其学术影响力，使书院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研究课题。

先生认为，无论是中国教育思想史还是教育制度史研究，都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那就是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先生指出：“科举考试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酝酿和萌芽到形成和发展，从逐步完善到日趋衰败，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地位、作用和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对它的评价应该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隋唐、两宋利多于弊，得大于失；元、明、清逐渐转化，特别是明中叶后至清末，显然已经是弊多于利，失大于得，最终走向衰亡。我们不能以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某一发展阶段利弊得失的考量，作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整体评价，更不要以对前期的考量否定对后期的考量，反之亦然，这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③依据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先生主编了《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并为该书作序）；发表了

^{①②③}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自序”、12—13页“自序”、18页“自序”。

《历史地看待兴科举和废科举》(《湖北招生考试》2006年第2期)、《北宋的科举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启示》(《教育与考试》2007年第4期)等专题性论文,生动再现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教育生活中的真实样态,充分展现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生命活力及其积极意义。先生关于科举制度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教育史领域如何遵循“真正的历史主义精神”来展开问题研究。

先生对于私学的研究,既弥补了教育史领域关于私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又为后世提供了如何将历史研究与解决实现问题结合起来的学术案例。先生首先针对私学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一书的“序”言中,积极倡导教育史领域应当重视私学研究,“长期以来,多数中国教育史研究者以及大部分教育史教材和著述,多以研究官学为主,建立中国教育史特别是教育制度史的基本体系,而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内容十分单薄,体系极不完整,研究很不充分和深入”,因而,“从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从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都有必要对中国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作一番研究,以期增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且发挥教育史‘古为今用’的作用,为当代私立学校的发展提供某些历史的借鉴”。^①在此之后,先生又从如何办好民办教育的现实需要出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办教育又勃然兴起,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认识这种现象,民办教育兴起的背景、民办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民办教育发展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民办教育发展的前景,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及时作出必要的回答,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和民办教育的创办人与主持者,更应当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②为此,先生特意申请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中国私学、私立学校和民办学校研究”,先后用五年多的时间,对中国古代私学、近代私立学校和当代民办教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考察,形成了以《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总结道:“认真研究和总结我国私学、私立学校的历史传统,吸取经验教训。同时要充分了解和借鉴外国私立教育的发展道路和有益做法,真正做到‘以史鉴今’‘洋为中用’。丰富我们的认识,增长我们的智慧,把今天的民办教育、中国的民办教育办得更好。”^③先生关于私立学校的研究成果,充分彰显了教育史研究“以史鉴今”的学术价值,使教育史研究更加富有现实感和使命感,增强了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厚度和实践向度。这正是先生通过研究私学,给出的如何办好民办教育的答案。

总而言之,先生以书院、科举、私学为着力点,立足现实问题,坚持两点论,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二重性,不仅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研究的双重任务,而且为后续相关课题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法指引和行动指南。

三、构建“新教育学”何以可能

“新教育学”及“出口教育学”“进口教育学”“中国教育学”等,均为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学史遗稿》中提出的教育术语。陈元晖先生在收集、整理1979—1988年出版的“教育

^① 王炳照主编:《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序”。

^{②③}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347页。

学”著作之后,发现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千人一面”,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认为,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在于,大多数“教育学”著作都是按照同一个蓝本编写出来的,所依据的都是域外教育学的结构、理论和体系,故形成了由中国教师编写出了“进口教育学”的怪象。有鉴于此,中国学者唯有编写出“新教育学”,才能彻底改变“旧《教育学》”为“进口教育学”的怪象,才能向国外学者“出口”体现中国教育学的结构、理论和体系的“教育学”著作,才能将“进口教育学”变为“出口教育学”。而“新教育学”即“中国教育学”,“应该是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著作,它不是‘进口教育学’,而是自己的2 000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①这正是陈元晖先生从构建“新教育学”(“中国教育学”)的立场来系统总结教育史遗产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教育学史遗稿》的遗愿

先生在《中国教育学史遗稿》的“前言”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末,他(陈元晖)又不断地讲,要写一部‘中国教育学史’。他说:教育学要提高,不能单靠借鉴外国人,要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教育学也不是只有西方人搞的一种模式。写‘中国教育学史’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教育学的学术科学水平,而且具有世界意义,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②令人庆幸的是,陈元晖先生完成了“中国教育学史”的“尾”——《中国教育七十年》;令人遗憾的是,他留下了尚未完成的“头”——《〈礼记〉新读》。这一“头”与一“尾”,就是陈元晖先生《寻找能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的学术遗作。

陈元晖先生提出“教育学不是只有西方人搞的一种模式”的教育命题,事实上否定了近代以来关于西方教育话语、西方教育理论天然具有普遍的适切性的“自殖民化”认识,“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才是构建中国教育学的根本和关键;编撰“中国教育学史”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就在于依此可以展现“中国”“中国人”的教育形象,“任何民族、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本土文化的精神家园,中国需要一次精神的回归,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已有的精神财富。在回归中审视,在审视中清醒,在清醒中发现,在发现中完善,在完善中再建和创造饱含中国文化血脉的当代学术,以自己的丰实和独特,与世界各国同仁作有意义的对话”。^③在陈元晖先生看来,“新教育学”之“新”,是因为其具有三个明显的“新”特征:第一,“不是教科书,而是学术性的著作”;第二,“应该是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著作,不是‘进口教育学’,而是自己的2 000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忽视自己积累达2 000年(以孔子的《论语》算起)之久的宝贵遗产,是不能编出新教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不是以引用古人的片言只语为标志,应该是一种系统的总结”。^④故而,“新教育学”就是一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2 000年文化遗产的学术性著作。至于“新教育学”(也即“中国教育学”)为何起源于儒家,中国的教育理论家为何同样最早出现在儒家这一学派中,陈元晖先生认为是由儒家学派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决定的。“第一,儒家的主要职业是教师及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活动家。第二,私学是由儒家最先创立的,儒家始祖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这种盛况,别的学派难与匹敌。第三,有长期的教学经验。第四,总结了教学经验,写出了教学理论著作。”^⑤与此相

^{①④⑤} 陈元晖编著:《中国教育学史遗稿·陈元晖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1、111页。

^②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③ 叶澜:《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教育精神与智慧》,《教育研究》2018年第6期。

关，儒家四部原典——《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就构成了中国教育学的四大源泉^①，而居于首要地位的《论语》，既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著作，也是世界最早的教育学著作”^②。

在构成中国教育学的四大源泉之中，陈元晖先生又以《礼记》作为“中国教育学史”的“头”，这是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1）“汉代出现的《礼记》，就是一部儒家的教育理论的论文集，它汲取了先秦及当代（汉）的各家文章，汇成文集，这就成为戴圣的《礼记》。”（2）“《礼记》一书，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但如果不谈它在教育学方面的理论贡献，就不可能提高它在儒学中的地位。”（3）“《礼记》在哲学阵营中是一位诸儒，但在教育学的阵营中是一位汉子。”（4）“《礼记》是一部教育学著作，是一部儒家教育学说的集大成的作品。”^③如果说《礼记》是一部“集儒家教育学说大成的‘儒学教育学’”^④，那么，构成《礼记》的49篇文章之中又以哪一篇文章为首呢？陈元晖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学记》。“《学记》的地位，应该放在各篇之首，因为一部教育学的结构和体系，教学论部分是细胞，又是基础，通过细胞或基础，才能形成整体的组织和结构。教育学一般把教与学的问题，放在首先的地位，《学记》就是专论教与学的问题，所以《礼记》的‘通论’部分，应作为《礼记》的重点理论来读，而重点之重点是《学记》，不是《中庸》和《大学》，这是《〈礼记〉新读》不同于宋儒的看法。”^⑤以儒家的“教学论”专著“新”身份，位于《〈礼记〉新读》“导论”之后的首篇专题研究，就是《学记》在“中国教育学史”中的“新”地位，陈元晖先生由此而开启了构建中国教育学的实践之旅。

总而言之，陈元晖先生以构建“新教育学”为宗旨而撰写完成的《〈礼记〉新读》之“导论”“分论一：《学记》——儒家的‘教学论’专著”“分论二：《大学》——儒家的教育论名著”等学术成果，“为深化中国教育学史研究提供了学术范例，为教育学的未来发展指引了方向、描绘了愿景：中国的新教育学既是辩证的，面向未来的，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出口教育学’；也是富于文化自信又融汇中西，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开放的教育学；更是承继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充分彰显教育学文化内源性的中国气派的教育学”。^⑥虽然，我们未能目睹《中国教育学史》的全貌，但是陈元晖先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学术范例，“教育学界树立起辩证的学风，新教育学的问世就为其不远了。我们踮望着”。^⑦

（二）重续“中国教育学史”的心愿

先生在编撰陈元晖先生论文选集的“前言”中写道：“作为陈老的学生，我深知，陈老始终认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学，他一生奋斗、执着追求的目标是提高教育学的学术质量和科学水平。陈先生在晚年，几乎将全部精力用在构建‘中国教育学史’上。”^⑧究其原因，陈元晖先生认为，教育学史是教育学是否科学化的风向标，“教育学史就是研究教育学这一门科

^① 于伟教授在《陈元晖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管锥》一文中，将陈元晖先生的观点表述为：“中国教育学的四大来源可追溯至《论语》《孟子》《荀子》《礼记》。”于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管锥》，《教育研究》2019年第11期，第63页。于伟教授的“新表述”被《中国教育学论纲》一文所采纳，用来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教育学文化品格以中国魂”的教育命题，这篇论文还直接引用陈元晖先生对《大学》文本性质的认识。课题组：《中国教育学论纲》，《教育研究》2023年第4期，第5页。以上足以可见，陈元晖先生“新教育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②③④⑤⑦} 陈元晖编著：《中国教育学史遗稿·陈元晖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02、123、124、71页。

^⑥ 于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管锥》，《教育研究》2019年第11期。

^⑧ 王炳照主编：《陈元晖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前言”。

学的发展和发展的历史, 研究教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的历史, 及其如何从其他科学独立出来的历史, 研究它的独立史, 研究教育学怎样摆脱经院哲学的历史, 研究它从自然科学中怎样汲取方法上的指导的历史。教育学史应独立地成为一门科学的历史, 这对于树立教育学家的信心及今后发展科学的教育学都是必要的”。^①可惜的是, 陈元晖先生未能最终完成自己的心愿。

先生积极倡导中国教育学史研究, 一方面在于完成陈元晖先生的遗愿, 另一方面更在于改变教育史学者不注重理论的倾向。在先生看来, 教育史研究应该坚持研究本身及对教育认识历史的研究的双重任务。陈元晖先生最初提出“教育学史”这个概念, 其初衷就是希望通过开展中国教育学史研究, 从学科层面清理中国学者对教育认识的发展史。陈元晖先生以《礼记》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发端, 从教育学的角度对《学记》《大学》两篇进行了解读, 写成了《〈礼记〉新读》; 将中国教育学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到1989年”这70年的发展历史作为尾巴, 写成了《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对此, 陈元晖先生说: “我先做好一头一尾, 中间的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剩下的由你们来做。”正如“奉师命研究书院”一样, 陈元晖先生同样在生前曾多次与先生谈到中国教育学史研究一事。先生虽未曾从正面作出回应, 但先生一直在暗暗用力, “近些年来, 我一直暗自为‘中国教育学史’的撰写收集、准备着一点资料。在指导学生们论文的过程中, 我对古代教育家的论著进行重新研读, 作了不少读书笔记、心得。2008年第二学期, 应劳凯声教授之邀, 为教育学博士生开了‘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历史意识’专题讲座。我认为, 就教育史研究领域来讲, 前期在教育思想史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教育学史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换句话讲, 不同的教育思想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与发展历程, 从而形成思想发展史, 其本质是对教育认识历程的记录。从思想史上升到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 就形成了教育学史。我以前主编过《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有了这个积累, 我对撰写“中国教育学史”还是有了一点底气”。^②为了推进此项研究工作, 先生计划以编选陈元晖先生文选为契机, 来“迫使”自己下定决心, 动手做“中国教育学史”。但是, 天不遂人愿! 先生一语, “吾生有涯愿未尽”, 留给了后辈弟子无限的遗憾!

先生虽未完成陈元晖先生的遗愿, 但是, 对于后辈弟子如何开展中国教育学史研究, 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并集中体现在先生所阐释的两个“困惑”之中。一是教育史领域存在将文献研究理解为对教育本身历史研究的误区, “在教育史界, 由于长期没有明显的学科分化, 大家一直以为或致力于教育本身发展历史的研究, 而实际上教育史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一部分是教育活动本身的发展演变, 大部分却是历代教育家对教育认识的发展演变。因为研究教育活动本身的历史所能够依据的事实十分有限, 只能依靠大量前人遗存的文献, 而这些文献除直接记录着教育本身的事实之外, 更多的是前人对教育的认识。但是, 这些文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教育活动的真实, 是需要检验的, 而检验的客观依据又往往是不足的。而一旦将文献研究误以为就是研究教育本身的历史, 常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对此, 我常常困惑”。二是在教育史研究过程中缺乏(或未形成)独立的范畴体系, “中国教育学史研究依然有很多问题,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教育学以独立的学科形态出现是从近代开始的, 在此之前的古代教育学

^① 王炳照主编:《陈元晖教育文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第162页。

^②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第750—751页。

如何定义与表述？由于没有标志性的概念，在历史文献中虽然有教育名篇，但是没有形成有体系的教育著作，教育学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发展状态。而且最著名的教育家未必有教育学的专著，董仲舒、王充、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著作不能理解为教育学论著，近代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也没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著作。这些如何定位？如何将他们对教育学的认识归纳到系统的教育学史中去？对此，我仍然困惑”。^①先生两方面的“困惑”，直接关系到教育史学科乃至教育学学科如何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根本性问题。陈元晖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教育学史研究，就是为了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学，教育史领域探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教育遗产的学术价值就在于此。让中国教育学史化身为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一朵彩云，正是从陈元晖先生到王炳照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愿望！

总之，正如先生多次提及、写在《中国教育学史遗稿》出版之前的那句话：“希望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继续完成他未竟的心愿，继续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②作为先生的后辈弟子，理应继承和发扬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做好中国传统教育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工作，最终完成“中国教育学史”的师门宏愿！

（责任编辑：李 洁）

Reinterpreting the Modern Value of Wang Bingzhao's Educational History Thought with Confucius as Breakthrough Point: Also on Criticism and Inheritan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History in China

Sun Jie

Abstract: Mark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rticle *On "Good Scholar Should Seek for Official Career"*, Wang Bingzhao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to re-evaluate Confucius, which is just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history to re-evaluate Confuciu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the historical start to restore the basic position of educational history discipline in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educational science. Through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e puts forward a new method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educational heritage which is duality, two points and double tasks, and answers the basic questions of how to carry out criticism and inheritan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academic level, providing direction and path for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history to carry out basic theoretical issue research. Chen Yuanhui advocates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in order to construct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manner which is the academic value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China's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heritage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Wang Bingzhao; educational history thought; duality, two points and double tasks;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① 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49—750页。

^② 陈元晖编著：《中国教育学史遗稿·陈元晖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序”。